

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一篇，传伯夷、叔齐之事倒在其次，重点在太史公借题发挥，表达观点。孔子谓伯夷、叔齐“求仁得仁，又何怨乎”。太史公则认为《采薇》几句，还是或多或少有“怨”在其中。天命不可捉摸，往往恶人得到乐逸的生活，而贤者活不长久。

我读到此处忍不住哼了一下。伯夷、叔齐之事从前就听过，平心而论，不愿继位而相继逃出，身为皇子并没有考虑自己应当肩负的对国家的责任，仅仅为了成就自己的名声而一走了之，不可不谓自私；抱定顽固君臣观念，不看天下局势和伐纣的理由而一味谴责，不可不谓视野狭隘；不食周粟而死的行为相当没有建设性，若是看不惯，为何不以自身之力去改变现状，甚至为何不极端一点学学刺客列传中的诸位以身试法，只晓得饿死自己，倒似重点仍放在想要成就自己的身后名，不可不谓软弱无力，消极处理。《采薇》数句，确是有怨，怨的是天下不如自己想象的那般单纯美好。“神农、夏、虞忽焉没兮，我安适归矣？”把自己比作神农时人，责怪的是这个世界，而并不想出力去改变这个看不顺眼的世界。

先撇开我个人的这些想法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坚持自己的理念，不可不谓有气节，孔子“求仁得仁”是颇为中肯的评论。可明明是自己求死，却要怪到天命不仁、虐待好人的头上，未免是借题发挥。伯夷、叔齐若是能大展拳脚，照自己的信念去改变世界，又能维护气节又能得以善终，不是更好吗？这样的话，天命不就是能让“善人得善终”吗？这里明显就是以偏概全。

再读下去，哦，恍然大悟。太史公引了如下几句话：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”贾子曰：“贪夫徇财，烈士徇名，夸者死权，众庶冯生。”“同明相照，同类相求。”“云从龙，风从虎，圣人作而万物睹。”这几句都论的是物以类聚，太史公把自己类比成伯夷、叔齐的同类，贤良耿直，然而无法在时代大潮中实现自己应有的价值。这样一来，前面明显不过的借题发挥得到了合理的解释，这才是太史公写《伯夷列传》并评论了这么多的真正目的。对伯夷等人的评价是否是太史公的真实想法，是否合乎逻辑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些只是一个跳板，借着写他们，太史公其实是在写自己！

这让我想到在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里，情节、人物、世界观等等，有时追究其真实的来源及与现实的界限，其实无甚意义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当人物激烈地剖白自己的时候，当微小的动作、细腻的风景展现出情愫的时候，当在剧烈的戏剧冲突中看到命运的某张脸的时候，创造这个世界的作者的感情就真切地传达了出来。

所以读到这里，我觉得对于伯夷、叔齐二人事迹的看法是否一致，太史公的论述是否有破绽，并不重要了。结合他自身的经历，体会到力透纸背的对自己人生的悲叹，给予了这一短章压倒性的感人力量。文学作品中最精彩、最震撼人心的部分，必定与创作者的主观意识的呈现有关。当这一色彩显现的时候，无论文本最初的被创作的目的是什么，都会具有文学的特质。

另外，太史公让这样一篇“借题发挥”的列传居于列传之首，想想也颇为微妙，恰像是给其余列传乃至整部书都烙上了自己的烙印。“太史公曰”的评论出现在多处，多为对事评论，而这章所透露的个人情感和中其中的喟叹，更加使这部史书带上了“司马迁个人作品”的烙印。

不过，在中国史学史上，《史记》毋宁说是个异数。与之相较，《左传》《国语》不免显得有些冷冰冰，《通鉴》则承袭了它们的正统史家风格。而《史记》的某些主观印记，从读者体验来说，倒更有触动。如果说《左传》是“纯史”的话，《史记》则掺杂了N多的文学。这区别不仅仅是因为修辞、叙述技法的成熟，或者价值引导的隐现，而是因为它具有了不可替代的，叙述主体个人生命体验的投射。



▲ 李唐《采薇图》

风景背后的士大夫情怀

◆ 邵毅平



▲ 夏永《岳阳楼》



▲ 安徽滁州醉翁亭

真正的主角则是风景中的士大夫，或者说风景背后的士大夫情怀。接着的一段同样是以自然风景描写为铺垫，而最终落实到人文风景乃至作者自己身上：

若夫日出而林霏开，云归而岩穴暝，晦明变化者，山间之朝暮也。野芳发而幽香，佳木秀而繁阴，风霜高洁，水落而石出者，山间之四时也。朝而往，暮而归，四时之景不同，而乐亦无穷也。至于负者歌于途，行者休于树，前者呼，后者应，伛偻提携，往来而不绝者，滁人游也。临溪而渔，溪深而鱼肥；酿泉为酒，泉香而酒洌；山肴野蔌，杂然而前陈者，太守宴也。宴酣之乐，非丝非竹，射者中，弈者胜，觥筹交错，起坐而喧哗者，众宾欢也。苍颜白发，颓乎其中者，太守醉也。

那么，为何风景描写最后总是落实到作者自己，也就是那个做“太守”的士大夫身上呢，文章的最末一段才说出了此中真意：

已而夕阳在山，人影散乱，太守归而宾客从也。树林阴翳，鸣声上下，游人去而禽鸟乐也。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，而不知人之乐。人知从太守游而乐，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。醉能同其乐，醒能述以文者，太守也。太守谓谁？庐陵欧阳修也。

真相大白，原来一切的好风景，从自然风景到人文风景，说明的都是作者的“政绩”，即善于治理地方。所以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也不在山水之间，而是在乎“政绩”也！“从前许多铺张，俱有归束。”（《古文观止》卷十）其间的关系，后来明代的文徵明以王羲之兰亭会为例，说得比较透彻：“兰亭之会，殆其政成之暇欤？昔人谓信孚则人和，人和故政多暇。余于右军兰亭之游，有以知当时郡人之和也。”（《重修兰亭记》）（其实六朝的王羲之未必有这个意思，而可能是受过宋人影响的文徵明的附会）于是，《醉翁亭记》与《岳阳楼记》一样，以风景描写为“载道”的手段，最终表现的则是士大夫的情怀。如果说两篇文章有什么不同之处，无非是《醉翁亭记》更自恋一些而已。

宋代风景描写中的这种新变，与唐代作一对比就更为分明了。欧阳修的《丰乐亭记》的开头，很像柳宗元的《永州八记》，也是先写如何发现滁州郊外的

风景，如何“疏泉凿石，辟地以为亭”（但没有《永州八记》中常常隐含的“征服”意识）；但接着就与柳氏分道扬镳了——柳宗元是悠然独赏，欧阳修是与民共乐：“与滁人往游其间”，“日与滁人仰而望山，俯而听泉，掇幽芳而荫乔木，风霜冰雪，刻露清秀，四时之景，无不可爱”；最终则归结到自己的“政绩”，以及皇上的“恩德”：“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，而喜与予游也。因为本其山川，道其风俗之美，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，幸生无事之时也。夫宣上恩德，以与民共乐，刺史之事也。遂书以名其亭焉。”写得比《醉翁亭记》直白多了，正可与《醉翁亭记》对看。后人看出了其与《永州八记》的联系与区别：“作记游文，却归到大宋功德休养生息所致，立言何等阔大……较之柳州诸记，是为过之。”（《古文观止》卷十）——但到底是“过之”还是“不及”，这却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。

士大夫的情怀，不仅表现为“达则兼善天下”，也表现为“穷则独善其身”。如果说《醉翁亭记》《丰乐亭记》表现的是前者，王禹偁的《黄冈竹楼记》表现的便是后者。其中描写了“山光”、“江濂”之类“幽闲辽复，不可具状”的优美风景，但重点尤在于表现身处逆境的士大夫的“独善其身”心态：

子城西北隅，雉堞圯毁，蓁莽荒秽。因作小楼二间，与月波楼通。远吞山光，平挹江濂，幽闲辽复，不可具状。夏宜急雨，有瀑布声；冬宜密雪，有碎玉声。宜鼓琴，琴调虚畅；宜咏诗，诗韵清绝；宜围棋，子声丁丁然；宜投壶，矢声铮铮然；皆竹楼之所助也。公退之暇，被鹤氅，戴华阳巾，手执《周易》一卷，焚香默坐，消遣世虑。江山之外，第见风帆沙鸟、烟云竹树而已。待其酒力醒，茶烟歇，送夕阳，迎素月，亦谪居之胜概也。彼齐云、落星，高则高矣，井幹、丽谯，华则华矣，止于贮妓女，藏歌舞，非骚人之事，吾所不取。

即使身处逆境之中，也能不以迁谪为患，而是不改初衷，坚持操守，玩诗书，赏风景，等待着东山再起的机会。这同样是一种士大夫情怀，隐含在优美的风景描写背后。

三

说起来，像《岳阳楼记》这样的文章，是最早感动了我的古文之一，其中出色的风景描写，更曾让我神往不已，初读时的鲜烈印象，至今还历历在目。这也就说明，具有士大夫情怀的风景，虽然成了“载道”的手段，但照样可以写得出色，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。而就《醉翁亭记》《丰乐亭记》而言，日常生活中果能遇到如是好官，也自然是一方百姓乃至风景之幸（想想有多少“煞风景”的“父母官”吧）。正是这种作为“载道”手段的风景，因为带上了士大夫情怀的投影，反而具备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独特魅力，成为中国文学中风景描写的新的特色，也是宋代文学对于风景描写的新的贡献。

但是，这种风景描写的局限也是极为明显的。如果一味沉溺于“载道”的风景描写，不惟可能在拙劣的作者手里走向虚假，而且也无助于风景描写本身的进步。比如到了此类文章里的“巅峰”之作、明初宋濂的《阅江楼记》，在重复了一通《黄冈竹楼记》的“齐云”、“落星”之说后，即成了“风景不知何处去，唯剩皇恩空悠悠”的官样文章，上追《丰乐亭记》而又变本加厉之了。所谓“游人去而禽鸟乐也”，所谓“欣欣此生意，自尔为佳节”，“草木有本心，何求美人折”（张九龄《感遇》），都说明真正的风景其实并不依赖于“载道”而存在。

一

六朝隋唐文学中经常表现的宏大风景与渺小个人的对比，进入宋代以后，为苏轼用哲学的达观（如《赤壁赋》的“变”与“不变”之说）所消解，从此以后成为或不再成为“老生常谈”；唐代文学中由柳宗元的《永州八记》所代表的对“化外”风景的“征服”意识，也随着宋代的偏安退守而难再出现；而随着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的增强，古文运动以来“文以载道”的道统文学观的兴盛，在宋代文学的风景描写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内容，那就是风景背后所常常蕴含的士大夫情怀。这给中国文学风景描写的传统增添了新的特色。

在这方面，宋代风景描写的一些名文，如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，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《丰乐亭记》，王禹偁的《黄冈竹楼记》等，都可以作为有代表性的例子。

二

先看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。起首交代作文原由，是“滕子京谪守巴陵郡，越明年，政通人和，百废俱兴，乃重修岳阳楼，增其旧制”，便已经点明了修楼与“政绩”的关系。随后，用“予观夫巴陵胜状，在洞庭一湖。衔远山，吞长江，浩浩汤汤，横无际涯；朝辉夕阴，气象万千。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，前人之述备矣”，一笔带过了通常可能有的风景描写的老套，而以“然则北通巫峡，南极潇湘，迁客骚人，多会于此，览物之情，得无异乎”，引出了风景所引发的“迁客骚人”（士大夫）的不同心态，同时也是两大段著名的风景描写：

若夫霪雨霏霏，连月不开，阴风怒号，浊浪排空；日星隐耀，山岳潜形；商旅不行，樯倾楫摧；薄暮冥冥，虎啸猿啼。登斯楼也，则有去国怀乡，忧谗畏讥，满目萧然，感极而悲者矣。

至若春和景明，波澜不惊，上下天光，一碧万顷；沙鸥翔集，锦鳞游泳；岸芷汀兰，郁郁青青。而或长烟一空，皓月千里，浮光耀金，静影沉璧，渔歌互答，此乐何极！登斯楼也，则有心旷神怡，宠辱偕忘，把酒临风，其喜洋洋者矣。

其中所描写的已不再是“客观”的风景，而是带上了士大夫心理投影的风景，以及他们在不同风景面前的心理变化。而作者的点题之笔尤在最后一段：

嗟夫！予尝求古仁人之心，或异二者之为。何哉？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。是进亦忧，退亦忧。然则何时而乐耶？其必曰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欤？噫！微斯人，吾谁与归？

在作为士大夫之榜样的“古仁人之心”面前，风景已经完全成为不重要的东西，而对“天下”的社会责任感才是压倒一切的，风景描写于是退而为“载道”的手段。

再看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。劈头第一句“环滁皆山也”即为写景名句，接着的几句也是很不错的写景：“其西南诸峰，林壑尤美。望之蔚然而深秀者，琅琊也。山行六七里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，让泉也。”但风景写着写着，就引出了一个名叫“醉翁”的太守，其实也就是作者自己：“峰回路转，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，醉翁亭也。作亭者谁？山之僧智仙也。名之者谁？太守自谓也。太守与客来饮于此，饮少辄醉，而年又最高，故自号曰醉翁也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。山水之乐，得之心而寓之酒也。”这已经颇具象征性地暗示了，风景始终只是表面上的主角，